

Zhonghua
Wenhua Gailun

中华文化概论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曹顺庆 徐希平 主编

孙纪文 汪文学
房锐 熊伟业 副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中华文化概论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曹顺庆 徐希平 主编

孙纪文 汪文学

房锐 熊伟业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概论/曹顺庆,徐希平主编.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7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5624-8480-6

I. ①中… II. ①曹…②徐… III. ①中华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6132号

中华文化概论

主 编 曹顺庆 徐希平

副主编 孙纪文 汪文学 房锐 熊伟业

策划编辑:费曼 雷少波 林佳木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费曼

责任校对:关德强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万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8 字数:516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8480-6 定价:4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编委会

主 编 曹顺庆

编 委(按拼音排序)

曹顺庆 邓时忠 冯宪光 付飞亮

付品晶 傅其林 干天全 靳明泉

李 凯 廖思湄 刘 荣 刘 迅

刘 颖 刘文勇 马 睿 孙纪文

王 进 王友亮 魏 红 鲜丽霞

肖伟胜 谢建英 熊伟业 徐 蔚

徐希平 徐行言 阎 嘉 杨红旗

杨亦军 杨颖育 赵渭绒 支 宇

主编助理 李 菲

《中华文化概论》 编委会

主 编 曹顺庆(四川大学)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

副主编 孙纪文(西南民族大学)

汪文学(贵州民族大学)

房 锐(四川师范大学)

熊伟业(四川旅游学院)

参编人员(排名不分先后,同一所大学的编写人员按编写章节的先后为序):

西南民族大学:马建智 苏利海 左志南

谭 敏 张仲裁 岳振国

赵 红

四川师范大学:赵俊波 汪燕岗 张 海

四川文理学院:丁庆刚 王籽邴 崔宏艳

李亭亭

贵州民族大学:叶成勇 扶平凡 袁洪流

喻守国 杨锋兵 郭国庆

福建师范大学:李彬源

总序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羨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致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与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等还与中学重复。于是只能陷入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以,我认为对高校中文课程进行“消肿”,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时,让学生多一些阅读作品的时间,是我们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针对这种“空洞”现象,我们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课程,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应该搞简单一点,集中讲授,不要什么都讲,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在规定的学生必读书目的基础上,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查、课堂讨论、写读书报告等。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多年来,我们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包括一些新编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

一套体系。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文化素质教育,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相信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须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为什么是“走了样”的呢?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更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自己没有真正地阅读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或“诸子集成”,却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这是很糟的事情,是造成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

那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会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丛书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 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丛书第一批九部出版以来,被多所学校选作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者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读者反响良好。目前第一批已经全部安排重印或者修订,以期精益求精。同时,在出版社的倡议和推动下,我们启动了第二批教材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依然由我担任总主编,在第一批书主编的基础上,第二批书进一步邀请四川大学著名学者冯宪光教授、阎嘉教授、干天全教授、傅其林教授、刘荣教授等分别担纲主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批的编写工作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主编及编写人员的组织遴选上不限于四川大学,而是将兄弟院校一些有专长、有影响的学者邀请来一起做。如,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徐行言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希平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肖伟胜教授、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刘迅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邓时忠教授等。相信通过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丛书第二批将更能代表和体现教学的需要,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

曹顺庆

2014年7月于四川大学

目 录

引言 (1)

上 编

第一章 先秦诸子 (11)

第一节 先秦诸子与中华文化 (11)

第二节 先秦儒家 (17)

第三节 先秦道家 (27)

第四节 其他先秦诸子 (35)

第二章 儒家思想 (45)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文化特质 (45)

第二节 先秦儒家思想 (50)

第三节 两汉经学思想 (67)

第四节 魏晋隋唐时期的儒学思想 (72)

第五节 宋明理学思想 (83)

第六节 清代实学思想 (96)

第三章 佛教思想 (104)

第一节 佛教思想精义 (104)

第二节 禅宗 (110)

第三节 佛教与士大夫 (116)

第四章 道家思想 (124)

第一节 道家学说 (124)

第二节 道家与道教 (132)

第三节 道家文化与养生 (139)

第五章 礼仪风俗 (145)

第一节 礼仪制度 (145)

第二节 饮食服饰 (153)

第三节 婚姻风俗 (162)

第四节 地域民俗 (171)

中 编

第六章 汉语与汉字	(181)
第一节 汉语	(181)
第二节 汉字	(188)
第三节 汉语言文字与文化	(196)
第七章 诗与骚	(206)
第一节 诗经	(206)
第二节 楚辞	(213)
第三节 诗骚精神与古代诗歌	(219)
第八章 唐诗宋词	(224)
第一节 唐诗	(224)
第二节 宋词	(231)
第三节 唐诗宋调与海外中国文学	(241)
第四节 宋诗	(247)
第九章 明清小说	(266)
第一节 《三国演义》	(266)
第二节 《水浒传》	(271)
第三节 《西游记》	(275)
第四节 《红楼梦》	(280)
第五节 明清小说与古代叙事艺术	(285)
第十章 古代艺术	(293)
第一节 古代音乐与舞蹈	(293)
第二节 雕塑艺术	(299)
第三节 书画艺术	(303)
第四节 建筑园林艺术	(309)
第五节 古代戏曲	(314)

下 编

第十一章 上古史	(327)
第一节 古史系统	(327)
第二节 出土文献与考古	(336)
第十二章 史书体例	(343)
第一节 二十四史	(343)

目 录

第二节	编年体和纪传体	(353)
第三节	纪事本末体	(361)
第十三章	古代史学	(369)
第一节	史官与历史意识	(369)
第二节	史学名著	(377)
第三节	古代史学的成就	(383)
第十四章	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	(389)
第一节	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	(389)
第二节	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397)
第三节	中华文化的传播	(406)
第十五章	古代教育与科学技术	(411)
第一节	学校与科举	(411)
第二节	古代科技	(426)

引言

我们为什么要读中华文化典籍

——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张金梅（以下简称张）：曹老师，您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文化典籍的“读经热”，四川大学也非常重视文化原典的阅读，并将“中华文化”课作为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何在？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所谓的“读经热”，又称之为“国学热”。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会在国内出现“读经热”“国学热”，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

近、现代之交，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产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当西方文化夹带着政治、经济优势强行冲向中国之时，中国文化被迫“大河改道”，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告别了传统文化。这种“改道”一方面是外国文化的抢滩登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在优势的西方文化面前，通过一番碰撞、挣扎后，转过来向西方文化学习。我们的知识分子通过一番“论战”，逐渐认识到我们故步自封，守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行的，要向西方学习，“求新声于异邦”，于是掀起了“出国热”。当时我们很多相当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学者都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那么，就这一次向西方文化学习和西方文化冲进来的合理性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我们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即所谓“拿来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历史的大趋势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大河改道”。这种“改道”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新文化、现当代文化就是在这次“大河改道”中形成的。

这种“改道”走过以后，近些年来，国内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转折趋势。今天的“读经热”“国学热”就是这种现象之一，这可以从很多学者身上看出来。有很多学者，包括在西方待了很久的学者，他们当年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却都开始转过来倡导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典型的例子如季羨林先生留德十年，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大力倡导重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认为不能完全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反对“贾桂”思想。有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

东方文化必将复兴。”现在回过头来看，季先生是有很敏锐的眼光的。现代著名诗人郑敏当年也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骨干，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也是大力倡导的。原先热衷西方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王岳川教授现在却转过来提出重新“发现东方”，倡导将中国文化“输出”。我曾提出“失语症”，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求读“十三经”，背《文心雕龙》《文赋》。我们老中青三代学者，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学者也都是如此，他们有的强调读经，有的主张学习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有的大学还建立了“国学院”。这是一个信号，中国文化又一次转折的信号！这种转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意愿，而是一种潮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势不可挡，这种潮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也是事关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认识得清楚、深刻，那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机遇；处理得不好，就很可能干扰我们的教育发展和文化发展，干扰我们的学术研究。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握住这次文化发展的机遇，顺应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与这股“读经热”相应，您自1995年起，就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课程。请问您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其重要性何在？如果不开设会有什么危害吗？

曹：我从1995年开始开设“中国文化元典”课程，迄今已有十余年了。我觉得开设这门课程非常重要。我以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因此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了解得比较深。同时，我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对西方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1994年回来后，我就着手开设以“十三经”为主的中国文化典籍课，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开设“中国文化原典”课，是与我的经历、思考相关的，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第一，在如何对待传统上，我曾将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其他东方、西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比如，同属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一样，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业产品、重要的高科技，如我们中国市场上就到处可见“三星”“现代”“丰田”“索尼”“松下”。然而，虽然他们都很现代化，但是他们对待传统却与我们不同。日本很多传统都保留得非常好，包括衣、食、住、行方面；韩国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尊敬，如韩国的钞票上印着的就不是总统头像，而是他们的古代文化人，如李退溪。印度也大致如此，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所有国家对待他

们的传统文化都与中国现当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当代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日本、韩国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实现现代化却非得将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不可，甚至我们全部打倒了传统文化却还没有他们走得快！更为严重的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情结：痛恨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国害惨了。这种看法给我们现当代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的现当代文化几乎处于一种“快断根”的状态。大多数西方人，包括西方中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传统文化都是尊重的；日本、韩国、印度也都非常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而中国却痛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目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由此就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博古通今者日稀，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学术界与教育界，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对此我曾在《“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中作过相应论述，那是从人才培养方面探讨其危害性的。

第二，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何谓“失语”？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创新性。不学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就文学理论来说，我们传统的文论基本上从现实的文学生活中消失了，目前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效颦。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开口就是西方的。年轻人对于我们祖先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相反对西方却越来越感到亲切，很多人满口都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但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在我们的青年学者，甚至在一些中年学者中间，却非常陌生。当今的学者包括一些已经有名气的学者，很少有几个人真正地读过“十三经”，读过“二十五史”，读过“诸子集成”。当初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赶上西方，但结果却是我们一直处于追赶西方的被动状态。长期追随西方，我们的创新活力正在丧失，现在似乎只能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整体性地成了西方文化的“大后方”。比如文学理论，在中国，有中文系的地方都有研究文学理论的，再加社科院、文联以及其他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却非常落后，没有原创性，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理论。迄今，中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

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历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情况也大致与这差不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值得深思。

第三，在整个现当代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返本开新”，因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全世界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西方文化有其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希伯来文化拿过来的《圣经》；当代发达的西方社会，一直守护着《圣经》等文化典籍中的文化家园，印度、阿拉伯等其他民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家园；而我们当代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哪里。我们有个别中青年学者很聪明，但最后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家园，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如今我们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我们没有文化家园有关。比如，今天大家都非常痛恨贪官污吏。其实，贪官污吏的出现除了监督体制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只不过，这个文化上的原因我们没有去探讨过。为什么贪官污吏会前仆后继？一个人的内心修养，一个人的文化家园，一个人在文化熏陶下的操守、道德重不重要呢？任何一种文化都强调人的道德、操守和自我的约束力，西方文化如此，中国文化也如此。古人讲“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讲要有“良知”，要有“追求”。古代的仁人志士强调“民本”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慎独”，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不论你认为这些思想好也罢，坏也罢，它却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家园、心灵家园，现在我们都没有了。今天一些人唯利是图、唯钱是图，社会上一些精神空虚现象都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是有关系的。中国整个文化的“空心化”、中国人缺少文化家园感，以及我们今天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和文化家园、“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失语”、缺乏创新性等都与此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失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已经对当代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人才培养到学术创新，到社会风气。我觉得应该恢复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害人精”，将其彻底“打倒”“批臭”，而是应该好好学习、继承。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当然，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糟粕，也确实还有一些不适合现代的东西，一些要不得的东西，甚至要批判的东西。但是即便我们要批判，也应先看懂、读懂，先了解它、知晓它。然而，我们有些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的中青年学者，常常不看、不读，甚至连传统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大肆批判。这种现象我觉得很可悲。

张：近年来，一股“少儿读经热”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而关于该不该读

经的争论也成为媒体和学者的热门话题。对此，您有何看法？您认为3—12岁的少儿应不应该读经？他们死记硬背自己不能理解的经典有何利弊？在该不该读经争论的背后，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曹：关于少儿读经的问题，归根结蒂还是源自于我们对教育的反省。我说过，目前是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然而，“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学术界，曾经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从钱钟书到季羨林，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性地产生出来的。例如，文学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学术研究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范文澜，乃至自然科学上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些大师是如何成为大师的？他们有他们的成长历程。简言之，这些大师有两大特点。第一，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第二，长大以后都出国留学，被西方文化浸泡过，或受过国外文化熏陶。如胡适到美国去、钱钟书先生到英国去、季羨林先生到德国去。从他们的成长历程来看，有两点很重要，影响非常大。一是从小学习经书，一是到国外亲身体会过西方文化。古文、外文都学得很好。如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呢？一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读过“经”，拿着“经”就头疼，对中国文化典籍没感觉。二是我们的外文都不好，大多数人没去西方真正体验过，拿着西方的原文典籍很多人不会看，很时髦的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如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都是从“二手货”、“三手货”、“四手货”的翻译书上学习的。这就形成了没有学术大师的原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还能否真正培养出像钱钟书、季羨林那样的人才来，我们的教育怎么走？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教育，从小学就学那些应试教育课本，中学也学那些课本，大学还学那些课本，学校课程还和我们现在的设置一样，势必仍然会出现“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势必会造成更严重的人才断层！

我倒没有倡导幼儿读经。我猜测现在有人倡导幼儿读经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曾问过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很扎实。我问他：“杨先生，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功底？”他说：“没什么，我是从小就学的。”我问：“您从小就学经，如《三字经》《诗经》。您当时读‘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尤其是后面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懂不懂啊？”他笑着说：“哪里知道呀，七八岁的小娃娃！”我就问他：“您这样读不懂有什么用？”他想了想说：“不对，如果那时我没有读，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了。”他这句话，我觉得大有深意。今天我们若想真正从理论上来说明少儿读经就是好，或者说少儿读经就是坏，这还很难讲。但杨先生的话可供大家参考。杨先

生若不是从小读“十三经”，他就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还有，像钱钟书那样的大师，如果他从小不读“四书”“五经”，恐怕在当代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今天到底少儿该不该读经？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偏见的。例如，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在学习英语，而且很多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起。关于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争议。从小学英语，从小学唱外语歌，学习西方文化，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反对；而从小学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反对的意见就很大。显然这是一个问题。3—12岁的少儿，是一个潜意识的形成期，包括小孩出生时的牙牙学语等，他们的学习都是潜移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到外国去，小孩和外国人生活在一块，就会成为“小香蕉人”“黄皮白里”。他还是中国人吗？他成了西方人，他在文化上成了西方人。换句话说，在文化上，他受到了陶冶。若要陶冶，就应该从小陶冶其文化的“根”。既然小孩能从小学英语，从小学习西方文化，为什么就不能从小学习点中国古代的经典呢？所以我还是赞成既从小学英语，又从小读经。

有人认为小孩读经会毒害小孩的心灵，因为“四书”“五经”是“杀人”的、“吃人”的文化，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传统文化典籍，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其实，今天我们让小孩去读经，是有“选择”的，主要是学习一般的启蒙经典，并没有让他们去学习所谓的“三从四德”。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担心小孩读经根本读不懂。这是事实，的确很难懂。但是诚如他们学习英语一样，我也认为很难懂，但是只要他学了，从小陶冶了就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记得最牢的、学得最好的，还是小时候的东西，小时候的陶冶。所以从整体上说，我是赞成的。小孩可以学英语，小孩也可以读经。从小就培养外语好的学生，从小就培养古汉语好的学生。小孩既可以讲“之乎者也”，也可以讲“English”。我们大师的苗子可能就在其中了。

张：有人认为读经是“复古”，还有人认为读经会有“致人蒙昧之嫌”，您认为呢？

曹：读经就是“复古”，那么，学习什么不是“复古”呢？！有人认为学习西方的东西就不是“复古”，认为学习“诺亚方舟”“亚当夏娃”“伊甸园”就很时髦。其实，它们也不过是西方（其实是东方希伯来文化）古代的而已。人类文化原本就是一个不断传承、积累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复古”和创新中，是在一边继承、一边发展中前进的。难以想象，一个不学习古代文化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有大智慧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任何人的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任何文化都是有传承性的。然而，今天很多人却觉得好像我们不用传承古代的，我们传